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七期 ——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4c)

【文革公案】	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	卜伟华
【百家争鸣】	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	佚名
【史海钩沉】	“旗手”风波	阎长贵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一）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公案】

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

• 卜伟华 •

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孙言诚的《青海二·二三事件》（以下简称《孙文》）一文，这在文革史几乎成为国内绝大多数期刊禁区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孙文》大致讲清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如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说成是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把后字205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张晓川的职务说成是副军长（应为副主任）。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一谈有关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问题，同时，对《孙文》做一些补充与订正。

一、青海“二·二三”事件是1967年“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爆发；另一方面，它也是1967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加剧的“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面夺权”必然造成全国已经很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敢于走这一步险棋,是他认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乱子再大也可以收拾。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他所钟爱的“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

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2、3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1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2月5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此事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开始介入解决内蒙问题。

在湖南,2月4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1)(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2月5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2)2月7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3)

在湖北,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3月3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4)。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5)许世友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22人被逮捕、8人被开除、475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10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330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6)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450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238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3月22日至28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508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1196人〔7〕。

在吉林，驻军（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3月4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8〕

在四川，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2月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22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337人。2月21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2月28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3月2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9〕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颁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地镇压。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10〕3月9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3月22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8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14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11〕

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抓人最多的是四川，而打死人最多的则是青海。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打死169人，打伤178人。

二、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孙文》中说：“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

实际上，“文革中首次暴发的大规模血案”当数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1月12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1月19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1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12〕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1月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13〕。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14〕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可能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5〕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16〕

2月7日、8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2月10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2月11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三、1966年的反右派与1957年反右派

《孙文》中说：“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

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57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1966年有很大差别。1957年时，中共中央高层在反右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反右派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进行的。毛泽东搞反右派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形式还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而1966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转移到党内高层，他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把刘邓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打下去，并清除他们的影响，在全党全国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更左的方针政策。刘邓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们还想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套做法来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远在外地，让刘邓在北京相机处理，实际上是把刘邓放在这场大火上烤，结果真把刘邓给烤焦了。刘邓虽然还在前台指挥，但在所有的大政方针上他们都要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幕后的毛泽东手中。

文革初期，在刘、邓主持下，在所谓“五十多天里”的情况，现在确实很少有人提及。（17）但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对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关系重大，不搞清楚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真正深刻理解以后发生的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群众组织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性组织等重大问题。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示报告来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搞阶级斗争，揪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刘、邓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18），在他们亲自过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的运动中，都把一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了“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斗争。全国各地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把给单位领导人或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坏人”的事件。

文革初期，刘、邓的一套做法是沿续过去反右派运动的做法，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比1957已大不相同了。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在全社会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话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之类的口号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用1957年反右派的做法，其结果可能更为可怕，最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要比1957年更多。

毛泽东反对刘邓在文革初期的做法，并不说明他反对过去反右派的做法。毛泽东要走得更远。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大革命”，声称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其严重后果不止十倍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文》说：“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这个说法不对，把时间搞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红旗》杂志1966年10月1日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提出来的。8月底9月初开始有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群众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各地的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1966年底或1967年初左右的

时间，造反派的力量压倒了保守派的力量，开始成为运动的主流。

五、戚本禹、关锋推动“二·二三”事件的逆转

“二·二三”事件前后，西宁政治局势大起大落。1月29日，“八一八”派的40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1月30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19）此时的“八一八”，顺水满帆，风头正健。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到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此时的“八一八”跌到了谷底。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按照戚本禹接受孙言诚访问时的说法，“二·二三”事件的逆转，是由戚本禹、关锋推动的。戚本禹回忆说：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如此，才有了毛泽东下令调查，以及后面的大逆转。

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如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来往死里整他，是从戚本禹等人写信开始的一样，其实是江青影响下的结果，而江青的言行又是很难和毛泽东分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江青主动要逆转青海局势的可能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中提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而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枪”问题上的态度。

六、刘贤权、赵永夫等人后来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22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

请示报告，同意撤销1967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20〕。3月31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21〕10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青海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22〕

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在济南军区当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1992年6月15日逝世，终年77岁。

赵永夫在被关押10年之后获释出狱。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央的批语说：“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赵永夫后来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逝世，终年72岁。

总政治部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责任问题是这样说的：“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看起来，赵永夫晚年的处境要比刘贤权好一些，至少赵永夫没有被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因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原来加在赵永夫头上的许多罪名都被取消了，但是他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的行为却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原谅的。

注释：

〔1〕批示的内容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2〕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第174页。

〔3〕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的讲话说，“湘江风雷”被逮捕的人数达五、六万之多。

〔4〕据王力1967年8月15日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说，武汉军区把“工总”的头头抓了516人。而据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与湖北代表座谈时武汉造反派学生代表反映，武汉共抓了2600多人。

〔5〕肖思科：《王平上将奉命两进北京城》，载于《中华儿女》1998年第7期。

〔6〕李文卿：《近看许世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29—30页。

〔7〕见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的讲话，1967年4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

〔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1967年8月17日）。

〔9〕参见《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据周恩来和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四川抓了有十万人。

〔10〕《八·二九战报》第2期。

〔11〕《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报告》，转引自叶青：《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2003 \ k 2 9 \ 2 0。

〔12〕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代表自治区党委发表了简短的交权讲话，并将一布包印章交给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尽管新疆军区是反对这一派夺权的，但“夺权指挥部”的领

导成员中还是有一位新疆军区机关二级部的副部长。（李近川：《中央文革记者让赴西北调查琐记》，《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辑总第103辑）

〔1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282页。

〔14〕武光当时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

〔15〕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

〔16〕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17〕萧喜东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就曾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中，将这“五十天”的历史称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历史。

〔18〕参见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整理的《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

〔19〕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版，第195页。

〔20〕孙言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将时间误为1979年3月。

〔21〕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1997年内部发行版，第259页。

〔22〕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

□ 选自卜伟华博客

~~~~~

## 【百家争鸣】

打倒贺龙的主谋到底是谁？

• 佚名 •

文革中贺龙被打倒，现在都说林彪是主谋。但如果把贺龙的遭遇与罗瑞卿、彭真、刘少奇的遭遇联系起来看，结论就会不一样。1965年12月份的上海会议整肃了罗瑞卿，同时不让贺再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意味着什么？毛在罗瑞卿垮台后，还多次讲“如果北京发生兵变，你们怎么办？”，他在担心谁？谁会搞兵变呢？罗已被打倒，刘少奇、彭真没有兵权，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他老人家总不会怀疑林彪吧？

林是中央决定的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有“林在林负责，林不在贺负责”的规定，林长期养病，有权不用，是自愿让贺管事的，如果不想让贺管，只要一句话就行了，用得着争吗？所以，那种说林彪为了个人野心跟贺争权导致贺龙挨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军队的权力已经在林彪手上了，要争权也只有贺跟林争权。贺罗也许对掌握军权很感兴趣，但林对军队那点权力并不感兴趣，否则就不会让罗长子管那么多事情了。罗之所以飞扬跋扈与林彪的放纵有很大关系。文革开始后林彪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信奉“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处世哲学。林彪根本不想管事情，会议都懒的参加，只派叶群去应付，所有大事都是能躲则躲。而贺罗正想多管些事情，正好各取所需。因此，林彪与贺罗并没有根本矛盾。当然，有时他们工作中也会有些矛盾，这很正常，任何时候都会有。但如果仅仅因为贺罗与林有矛盾，毛泽东是不会打倒他们的。毛泽东从来不希望下级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军队这样的重要部门，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被林彪一个人掌握的，那样老毛就要想办法“掺沙子”了。林与贺、罗有矛盾正是毛所希望的。



所以，那种认为“毛泽东整罗贺是为了取得林彪支持他搞文革”的谬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贺罗对毛泽东忠诚，即使林彪不支持毛，毛泽东还可以得到贺罗的支持，那对毛泽东是双保险，毛泽东何必把赌注压在林彪一个人身上？毛泽东绝对不会允许林彪因与贺龙罗瑞卿有矛盾而打倒他们。他们有矛盾对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毛泽东整贺龙、罗瑞卿的根本原因是毛认为他们与刘少奇走的太近，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尖锐斗争的时候不能保证罗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贺龙、罗瑞卿已经架空了林彪。军队可能不能完全听从林彪支持毛泽东。

1966年7、8月份，为了给大学里派工作组的事，毛、刘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两位夫人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观点截然对立。这个时候贺龙的表现显然是无法让毛满意的。整罗，他弃权。八届十一中（8月份）批刘，他不发言，还从总参调车护送刘的夫人上下班。有记录贺当时言论曰：“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枪杆子公开指责毛泽东的做法不好，毛能放心？

就在这个时候，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说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段德昌被杀与贺龙有关。1967年2月14日，原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揭发”贺龙给蒋介石写“乞降信”。说他父亲在临死时告诉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写过“乞降”信，企图“叛变投敌”。这封信他多处投递，其中也给了林彪，林又转给了老毛。林的这个举动现在被说成是迫害打击贺龙的证据。当时对很多事情林彪都是这样能推就推。按这些人的意思林应该怎样做呢？把信压下来吗？这个信又不是只给了林，“中央文革”也收到，他就是想包庇也是不可能的，弄的不好还给自己留个“包庇罪”。况且林彪并不了解贺龙的历史，不可能分辨这个检举信内容是否真实，交给组织去调查是最稳妥的办法。林彪本着“毛主席画圈我画圈”。“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原则，把它转给毛泽东处理，是最好的办法。毛泽东如果不想打倒贺龙，可以不立案不调查，就如同康生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老毛不发话，谁敢立案去调查他们的历史问题？如果毛泽东想打倒贺，不是叛徒也一样打倒（如杨成武等）。林有什么错？林彪转了一封信就是林彪要打倒贺龙？

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林彪，康生这些人是不可能对贺龙进行立案调查的。任何人中央领导人（不管他有无问题）擅自搞调查都是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4年9月29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关键是这个“中央”是谁？是谁批准对贺龙开展调查的？是林彪吗？为什么不明确说出来是谁？“现在经中央查证甄别（1974年9月29日）：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可是这个平反通知又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谁是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谁“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多亏杨成武在讲其它问题时一不小心说了老实话，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专案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他们敢吗？事实是，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当年劝说贺龙投降的人）居然把贺龙当年的两封信交给了专案组，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1929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现在说这些信是伪造的，谁伪造的？怎么没有笔迹鉴定报告？

其实，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按照林彪对他的谈话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关键是跟谁”。可惜贺龙与陶铸一样，不知道是没有听懂，还是自我感觉太好了，把林彪的话当成耳边风。虽然贺声称“我贺龙从来就是毛主席的人！”。可是毛泽东又不是傻瓜，不会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此时

毛主席与刘主席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还跟刘少奇粘粘糊糊。王光美受红卫兵冲击，贺龙见王骑自行车上班不安全，特地从军委总参派出一台卡车保护王上下班。刘少奇被批、贺龙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会上，大家都在批刘，他不发言，毛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贺龙挺身立正：“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贺以前对彭德怀怎么上的去“纲”？同时，贺龙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居然与江青面对面辩论了3个小时，虽说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可“打狗也要看主人”。江青也不含糊，直接告诉贺龙的女儿：“回去告诉你父亲，我们要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个好东西！”。虽然老毛当面对贺龙说“我是保你的”，但贺龙自己都知道那不过是毛的虚晃一枪。有人揭发贺龙“以前总要警卫处跟车，现在就是不让跟车……也不让调换他的警卫……”。“贺把枪一直带在身上。贺龙不管什么时候，都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此时，贺龙对中央警卫团保持很大的戒心，这明显是不信任毛泽东。因为中央警卫团一直是毛泽东通过汪东兴直接控制的，连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卫团。这说明，贺龙自己其实心知肚明，谁才有权力搞他。搞刘少奇时老毛对刘当面也是很“温柔”的，可一转脸就把他往死里整，毛向来是“各个击破”。而且毛泽东整人一般并不是自己亲自出面，很多时候往往是叫被整人的“好朋友”去整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叫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批判自己的亲信彭陆罗杨，毛泽东这一招是狠“毒”的，一方面让刘痛苦，一方面也是让彭陆罗杨绝望。整林彪的时候叫林彪“好朋友”周去与他谈话，去处理，使后来周总理痛苦的嚎啕大哭。更绝的是，毛泽东后来居然叫周恩来主持周自己的批判会。

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贺龙在文革中对批人、整人也有大量的参与和操纵。在军队，毛泽东和林彪要求稳定军队，对领导干部不要动，可是贺龙却公然唱反调说“个别的也可以动一动”。贺积极参与了军队和体委的造反活动。在海军，支持苏振华等人批斗李作鹏，在空军支持成钧批斗吴法宪。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发生“炮轰杨成武”事件——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在贺龙的支持下——在总参贴出总参作战部全体人员（包括部长，副部长）署名的“炮轰杨成武”的大字报。连周恩来都看不下去，提醒杨要小心。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是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杨勇是被他的政委廖汉生打倒的。廖是贺的外甥，如果廖在打倒杨勇前没有和贺商量过，鬼才相信。空军开会本来气氛不错，可是几个二方面军的干部会议期间从贺龙家串门回来后就立即“炮轰空军党委”，说贺“到处插手”并不过分。1967年2月3日，毛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这样不甘寂寞的贺龙对海军、空军、总参三个方面都插手，这样的行为好像还找不出第二人来，除了想发动文革的核心人物。1968年5月20日，毛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贺龙与林彪以前并没有大矛盾，他们的矛盾就是从此时才开始的。既然贺龙自己也加入了那一场丑恶的权力争斗之中，他无论作为整人者还是被整者，已无正、邪之分。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贺龙之间的斗争不是美女与野兽的关系，最多是野兽与野兽的关系。贺龙仅仅是那场权力角斗中的一个失败者，并不是正义的化身。贺其实也是咎由自取，7月份还在底下说：我要和林斗一辈子。我就不信反林就是反毛、反党。不过，8月份以后，贺就老实了，但此前的问题被他的部下陆续揭发出来……。贺在错误的时机跟林彪争权，林只是按毛泽东的意思顺手反击罢了。

贺龙的日子真正难过是从1966年底、1967年初开始的，但周恩来半年前就知道毛泽东要打倒贺龙了，周对贺龙的态度很早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被周冷峻的拒绝，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贺龙心里一沉：以前不是这样啊！7月当贺龙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让贺龙两口子纳闷了半天。周对老毛是绝对忠诚，虽然他与贺龙的交情是不错的，从个人感情上讲他也不愿意贺倒霉。但是一旦他知道老毛要倒贺龙，他绝对表现的比别人更积极，据说贺龙的案卷上周的批语最厉害，生怕老毛怀疑他与胡子有一腿。

贺龙就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住进了周家），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被解除了武装。然后，再被周恩来安排去“学习”。那个年月去“学习”与现在的“双规”是一个意思，是变相的逮捕！可以说，是周恩来亲自逮捕了贺龙。贺龙曾经搞过别人的专案，很清楚去“学习”意味着什么。但贺龙在周家脱离了自己的亲信警卫，实际已经被软禁，他敢赖着不去西山“学习”，周恩来立马就能拉下脸叫警卫把他拖出去！贺龙的待遇也不是从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后才改变的，实际上在去西山的路上，贺龙从“大红旗”被请出换成了破吉普，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

贺龙专案组组长开始是杨成武，杨倒后是黄永胜，但这个专案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林彪根本管不着。在贺龙被害的过程中，林彪虽有牵涉，但林彪决不是主谋。真正下手整贺龙的人正是老毛，再加上周恩来等人，林彪最多只能算是附和而已。后来为了污蔑林，才把毛泽东周恩来头上的屎往林彪身上泼。毛在给贺龙平反时说“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周在贺龙追悼会时连鞠七次躬，说没能保护好贺等等，这种姿态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他们的表演实是登峰造极了。其实要知道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在贺龙的一案的真正态度和作用也不难，只要把他们在贺龙案卷上的批语公布出来就可以了，但这些东西似乎从来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这大概不会是为了掩盖林彪的罪行吧！林1971年就死了，贺龙1974年还在被调查。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是在913之后被迫害致死。可在杨被“解放”后，周恩来如此跟他说：“对不起呀，我没有保护好杨易，记住，幸福想着毛主席，仇恨记在林彪身上”。林彪就是这样，将这个政党的一切丑恶担当了个干净，某些作恶的人至今还是伟人，圣人。如此历史，怎叫人不激愤！

整罗瑞卿、贺龙的主谋不是林彪，而主要是毛泽东。即使林彪想打倒贺龙，但只要毛泽东坚信贺罗忠于自己，他就绝不会允许林彪打倒他们。毛泽东整罗、贺也并非一些人说的，是为了取得林对他搞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只要有贺龙和罗瑞卿支持也一样搞文革，林彪一个病人，权力已经被贺龙罗瑞卿架空了，他不支持，毛泽东完全可以让林靠边站。毛泽东绝对不会因为贺龙罗瑞卿与林彪有矛盾而打倒他们。毛泽东整贺罗的根本原因是认为贺龙罗瑞卿与刘少奇关系密切。毛担心他们在毛刘的权力斗争中贺罗支持倒向刘少奇。毛泽东有自己的权力斗争计划，岂是林彪康生这些人想打倒谁就可以打倒谁的？1970年林彪在庐山想打倒张春桥，可是结果是张没有被打倒，林彪自己反而被毛泽东打倒了。康生揭发张春桥江青是叛徒，毛泽东不理他，康生能打倒他们吗？

□ 原载《飞扬军事》网站

~~~~~

【史海钩沉】

“旗手”风波

• 阎长贵 •

江青是“旗手”，“旗手”是江青，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这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旗手”作为江青的代名词，二十多年来遍布于很多关于江青以及不少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江青被称作“旗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桂冠”究竟是怎么来的？

对“旗手”的起源和来源，或者说，“首创权”和“发明权”，在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我看到有三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叶永烈的说法。他在《江青传》说：

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叶永烈同志说江青的“旗手桂冠”“源于此”，即源于她“参与”京剧和其他艺术形式（芭蕾舞、交响乐）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事实确实如此。但究竟是谁加封江青为“旗手”呢？他在这里没说。在《江青传》中，他在叙述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时，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他说（第349页）：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这个叙述看似合情合理，但并未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关于11月28日大会的“新华社3日讯”，大概有一万四五千字，篇幅占一个半版面（第1版转第2版），摘要报道了江青的讲话和其他好几个人的讲话和发言，除了有江青关于鲁迅是“伟大旗手”的那句话，没有江青是什么“旗手”之类的话。因此，我觉得，叶永烈同志尽管在这里说得很近情理，恐怕仍然带有推测和演绎性质，并不是历史事实。

有一种版本，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说法。他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说：

五月二十三日（按：指1967年——笔者），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万人大会。……这次大会从头到尾全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题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的报告。陈伯达和戚本禹的发言，不但继续“造神”运动，把讲话吹得不着边际，还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特别提到”“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则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说她“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我曾经相信过，因为他当时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我细按5月24日《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认真核阅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讲话，他们确实是把江青吹得很高（顺便说一下，关于戚

本禹的原话，并不是如穆欣所引的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而是“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按理说，“最勇敢”三个字是不该漏掉的），但“文艺旗手”的话却不见踪影；另外，还看了其他几个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们都吹捧江青很厉害，但同样未见“旗手”的说法。同日，姚文元在上海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竭力吹捧江青，说她“坚持了《讲话》中阐明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以排比的方式列举了江青在文艺方面的种种“功绩”，但他也没有提出江青是什么“旗手”之类的概念。

还有一种版本，是纪希晨的说法。他在《史无前例的年代》说：

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按：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笔者），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

纪希晨同志的说法也没有举出文字根据。我看也带有推测和演绎性质。只列出，不论述了。

那么，“旗手”的“桂冠”究竟是谁送给江青的呢？仔细翻检1967年5～6月份的《人民日报》，看到有两位京剧演员写的文章中，称江青为“旗手”，一篇文章说：“京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一篇文章说：“江青同志”是“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另外，张云生同志写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两处谈到江青的“旗手”问题。一处是，1967年4月份某天叶群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女演员，女演员说，我们想排点节目，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叶群表示：“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一处是，讲到1967年底成立的林彪任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其中除了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外，还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该提纲前后搞了四次草稿，后违背林彪、叶群旨意被收回销毁。到底是谁最早或第一个把“旗手”的桂冠送给江青，难以确考。我们从上述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到，到1967年5月份，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人们的讲话中，在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中，似还都没有把“旗手”的“桂冠”送给江青。而在当时大量出版和广泛流行的红卫兵小报上，江青头上“旗手”的“桂冠”早就满天飞了。兹举几例。一份叫做《首都红卫兵》的小报，1967年5月23日发表了《向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学习》的专论；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办的《电影批判》1967年5月份一期，提出“向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革命造反派编辑的《新军乐》1967年6月9日一期高呼：“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显然，江青——“旗手”，“旗手”——江青，在当时社会上流行和传播得很广泛、很普遍的。这就是我所说发生“旗手风波”的一些背景。

所谓“旗手风波”，是指下面这样一件事。

大概是1967年4月份，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让我看看，提提意见。这篇文章是京剧界很著名的一位当时即可称为表演艺术家的演员写的。她在六千字左右歌颂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文章中，热烈赞扬江青；我数了数这篇文章一共用了20多处“敬爱的江青同志”，

即凡出现江青的地方在前面都加上了“敬爱的”形容词，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对这篇文章，就我当时的认识和思想觉悟，从总体上讲，我是完全赞成和肯定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有所修改。在向江青汇报时，我谈了总的看法，又字斟句酌地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我跟江青说：“是不是不称您为‘旗手’好些？‘旗手’还应该说是毛主席。”对这条意见，江青说：“对！对！”接着说：“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我跟她说：“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下，有一、两个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显得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江青接受了我这两条意见，心理很满意，没产生其他什么想法。关锋，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管宣传工作。离开江青那里，我立刻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并把文章交给了他。关锋没有提出什么不同看法，他跟我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这个关，请她放心好了！”应该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很自然，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当时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某种心态的。

这篇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发表时，把绝大多数提到“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地方“敬爱的”三个字都去掉了，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称江青为“在文艺战线上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也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写这篇文章的演员看到“旗手”改作“战士”，很不满意，怒气冲冲拿着刊载她文章的《红旗》，找到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具体负责的文艺组（当时文艺组办公地方就在《红旗》杂志社办公楼）询问：“《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文艺组负责接待的人对她说，这件事与我们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她到《红旗》杂志社责问，《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大概她仍不满意。据说，其后这件事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他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找江青同志！”而就关锋和戚本禹的关系讲，我认为，关锋要戚本禹直接“去找江青”，只不过一句气话，恐怕还是向他说明和解释了个中缘由的。

这场风波当时我不知道，关锋、戚本禹都没有跟我说过，而我是在“文革”结束后很久很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听说的。听说后，心想：没想到，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场风波。事实上，这场风波的范围很窄，知道的人很少，在当时社会上并没产生什么影响。如前所说，林彪任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不是仍旧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吗？我还看到，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宣传组1967年12月编辑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铅印本），其附件最后一篇就叫做《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又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火车头”，在1968年6月编辑的一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材料（打印稿），其中也收录了《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还收有一篇，叫做《江青同志带领我们胜利地前进》，诸如此类的材料都狂热地吹捧江青为“英勇旗手”、“伟大旗手”，等等。肯定不止这些，还会有很多很多吹捧江青为“旗手”的东西。对这些，我就不去多说了。我之所以要辨证一下这个问题，是我认为在“文革”中，江青被捧作这样或那样的“旗手”，是一个很值得引起注意和一个很值得分析的现象。

□ 原载《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王广宇著 红旗出版社 2009年4月版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一）

· 舒 云 ·

## 60、大红旗车里谁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李文普为什么中途下车？据他自己说，他是听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才中途下车的。李文普的这个证词成了证明林彪知道去苏联的惟一证据。这就使事情更加扑朔迷离了。

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多次集中“林办”全体人员集体“排查”，不管在会上，还是会下，大家从来没有听李文普说过“伊尔库茨克”。到后来单独关押，才有了这个“铁证”。所以大家私下叫李文普是“王连举”（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叛徒）。

试想李文普如果没有“立功”，怎么可能对他的处理轻而又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审查，周宇驰并没有拉妻子王圣兰“入伙”，专案组只要她承认9月12日深夜是林彪亲自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要他北上的。王圣兰说，我只知道有人给周宇驰打电话，是谁打的不知道。专案组老是说，对不起来呀，你的态度不如周宇驰。实在挖不出“金银财宝”，1972年1月才告诉她，周宇驰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就死了。因为王圣兰不会“编”，被步步高升，从学习班到看守所，最后被关到北京市第一监狱，1981年12月21日才放出来。关了整整十年不说，还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与李文普相比，王圣兰的问题不知要轻多少倍，但最后的处理却比李文普重得多，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她没有“顺竿爬”吗？

那么“大红旗”里有人说过“伊尔库茨克”吗？

有人质疑，林彪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在“大红旗”上的六个人，五个人都有可能说，只有林彪不可能说。对于军事家来说，这简直是一句外行话。更何况苏联西伯利亚这座离中国最近的大城市伊尔库茨克，对林彪来说，有着一而再、再而三缘分。

1950年7月1日，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成立，开辟了以北京为中心飞往赤塔、伊尔库茨克和阿拉木图三条国际航线，这是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的正式开航。也就是说，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是新中国最先开辟的国际航线之一。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派林彪和周恩来来到苏联请求军事援助，他们坐苏联专机就是走的伊尔库茨克这条线，并在伊尔库茨克落过地。既然林彪到过伊尔库茨克，并在伊尔库茨克落地，他怎么能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林彪打仗前总要做到胸有“地图”。在东北，他常常五、六个小时甚至一天到晚骑在木椅上，一动不动，直到把地图全“吃”进肚子里。1969年10月5日，为准备对付苏联的进攻，林彪到张家口视察。因为要看地形，飞机飞得比较低，也比较慢。林彪一直不说话，时而拿望远镜望山，时而拿放大镜看地图。突然说，前面就是五台山吧？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说是，林副主席很熟吧？林彪说，走过，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他边听郑维山讲解，边拿放大镜从地图上找他熟悉的地名。

张云生回忆：1969年10月20日中午，苏联谈判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到北京。林彪平时12点前午睡，因为怕苏联突然袭击，他习惯的午睡也不睡了，等着苏联从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经过乌兰巴托，何时进入中国领空，何时到张家口，何时飞临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北京的报告一次次传来，秘书一次次报告林彪，直到最后一次报告，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并没有发生突然袭击，林彪这才放心去午睡。

如果林彪策划政变，为什么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不能像1969年“一号命令”那样，

回忆出林彪那么多的“军事行动”呢？就算林彪老了，忘性大，说过的事情转身就忘。但逃往苏联这么大的事情，就是忘了“有多远”，看一眼地图不就清楚了吗？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天天盯着地图看，不用尺子，也能大致看出“有多远”吧？不要说林彪沉默如金，他那样老谋深算，怎么可能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就算他想问，他也要想一想，一车人中谁能回答他这个问题。

大红旗车里谁有可能问“有多远”呢？林立果不是军事家，但总是当过几年作战部副部长。他既然准备了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而且一式两份（就像手令一式两份一样，被林立果和周宇驰分别带上三叉戟和直升机），还能疏忽如此重要的“有多远”吗？“保镖”刘沛丰本来话极少，在那么多大人物面前，更不可能说话。司机杨振刚也不可能问，他也不会关心“有多远”这样的领导考虑的问题。

说来说去，倒是叶群对“有多远”既一窍不通，又感兴趣。如果不是李文普编“故事”，真有人说了“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话，那这个人很可能是最沉不住气的叶群。可叶群也不是大傻瓜，车里六个人，有两位是工作人员，除了李文普，还有林彪的司机杨振刚，他们一旦知道“首长”要外逃，还会忠心耿耿吗？周宇驰在调直升机时，也是跟飞行员陈士印和陈修文说要到北戴河向“林副主席”汇报工作，哪里敢说外逃？当然到了天上往哪里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大红旗”里的六个人，只有中途下车的李文普还活着，他说林彪说的“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有旁证。在法律上，孤证不能算作证据。

#### 6 1、是谁打了李文普一枪？

“大红旗”被8341部队阻拦后，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大红旗”没有停，反而加速冲过去了。这时响了四枪，也有说响了三枪，也有说响了三枪，也有说响了三枪。

李文普打了一枪，车里的林立果也打了一枪，这没有争议。中队长萧奇明到底打了几枪，还不清楚。

我们就认为是两枪吧。萧奇明的那两枪没有争议，弹着点在“大红旗”司机杨振刚一侧的玻璃窗上。而李文普的“一枪”和林立果的“一枪”打向了谁？

“大红旗”又没有飞上天，弹着点很容易找到。林立果的一枪打在车门把上，只有李文普的一枪没有弹洞，只有弹壳。

李文普、林立果、萧奇明的手枪不一定是一个型号。就是同一型号，从位置上也很容易判断。可是林彪一案经过十年，两拨人审理，却根本就没有审理“大红旗”的枪案！

谁先打的枪？李文普？林立果？还是萧奇明？为什么不调查？查这个案子也要“宜粗不宜细”吗？

“大红旗”从8341部队的拦车处又窜出约200米，突然一个急刹车，姜作寿远远地看见车里跳出来一个人，站在车门边。有目击者听见李文普喊了一声，怎么个事嘛？几乎同时，“当”一声枪响。几秒钟后，又响了一枪。

李文普回忆：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脑子里第



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我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方向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向我开枪。

事实是这样的吗？

张清林回忆：天黑，灯光又微弱，两边有树，也看不清前面的车。我们越追越近，大概在离“大红旗”15米到20米时，“大红旗”呼地开跑了。

“大红旗”的车门也没关，就加大油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飞驰而去。萧奇明最先赶到，姜作寿在他后面30米。他们看见李文普半躺在地上，捂着左大臂的负伤处。这种时候，谁也顾不上负伤的李文普，姜作寿跳上随后赶来的大卡车，往机场追去。

李文普回忆：我自己捂着伤臂走向8341部队大队部，卫生员小陆给我包扎了伤口。

李文普坚决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

可是此时张清林在现场。他又偏偏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专门学过野战外科，熟悉枪伤。试想，和平年代极少能见到枪伤，一般人都会好奇，更何况科班出身的野战外科医生呢？张清林借口卫生员小陆的包扎不好，重新打开，实际上他是想看看伤口。

张清林回忆：给我当助手的是8341部队的卫生员小陆，我们给李文普脱下军装。血流得不多，贯通伤，伤口位于左臂内侧，内下外上，前面的伤口细，后面的伤口粗，因为子弹出口比进口要大，这说明是从前面打进去的。我注意到李文普的胸前有擦伤的血迹，看来子弹是贴着前胸的衣襟穿过去，左臂伤口的袖子上有一圈黑印，明显是被火药熏的。李文普说，叛徒打我了，叛徒打我了。我一边包扎一边问，谁是叛徒？李文普说，就是林立果。我一看就是自伤，我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气。包扎很快，只有两三分钟，副团长张宏问我，怎么打的？我说自伤。

这个过程，张清林对林豆豆和杨森都说过。1982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其实，李文普去医院治疗枪伤时就写材料说“枪走火”了。

李文普回忆：简单包扎后，8341部队要送我到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当兵，不好说话，就说去北京军区疗养院。经医生检查，子弹穿过左大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这是重大机密，只好说“枪走火”。

也就是说，李文普开始也承认是自伤，后来才改的口。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嘛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

李文普回忆：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上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

注意！李文普说的是“子弹”，他把“谁打的”和“子弹”分在两段里。上一段说林立果朝

我开了枪，下一段说“子弹”打中了我。

玩过枪的人都知道，如果是车里的林立果开枪，不可能朝天，只能朝下。8341部队天天玩枪，非常熟悉弹道，看弹着点嘛。受伤前李文普是站在“大红旗”的右边，子弹可能打到他的腿上，决不可能打到左上臂。8341部队向中央报告，车里面打了一枪，是林立果打的，子弹打在车的摇把底下，弹洞找到了，子弹壳也在车里。

林立果和李文普虽然都是手枪，但型号不一样，弹洞不一样，子弹壳也不一样。李文普那一枪的子弹壳掉在车外面，但弹洞没有找到。

## 62、李文普那一枪的弹洞“藏”在哪里？

林彪办公室警卫科长刘吉纯回忆：九一三之夜，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出来，我看见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带着部队也赶到机场，他已经把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都集中起来了。看机场已经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几个人就乘车返回北戴河。我以为李文普也在飞机上，下车后我才知道，他受伤住进了北京军区疗养院。反正也有车，我和林办秘书宋德金就去看他。我一看伤处，就知道是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李文普说“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

“大红旗”停车，李文普下车，到开枪，时间极短，李文普没有时间挪动。也就是说，李文普负伤的位置就在“大红旗”右边的车门边。

如果是林立果打的，怎么可能从“前胸”到“左臂”？李文普坐在司机右边，林立果的位置在第二排的右边。李文普下车后，如果面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只能从“前胸”到“右臂”，而不可能是“左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倒是有可能经过“胸部”到“左臂”，可是对不起，这个“胸”是“后背”，而不可能是“前胸”。难道李文普与别人不一样？左手在右边，右手在左边？或者林立果的子弹有特异功能，会拐弯，经过前胸，不往右臂钻，掉头直奔李文普的“左臂”？

真是天方夜谭啊！

李文普下车后确实打了一枪，打的是谁？你敢打谁？李文普你一个那么老的警卫干部，敢向自己保卫的首长开枪？胆子也太大了吧？这时车里坐着的是中国第二号人物，而你李文普又是专职警卫，竟敢向中国第二号人物开枪？如果“秋后算账”，你李文普还想不想活？枪毙你一万次也不为过，当然向自己开枪无所谓。

我们现在来分析李文普当时的心理，他想好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让停车，已经触犯了“龙颜”。可是在他下车时，枪突然“走了火”，他受了伤，当然不能再“鞍前马后”了，这就给自己找了个可进可退的万全之计。伤在哪儿？李文普也考虑好了，不能伤五脏六腑，只能冲胳膊腿打。在胳膊腿中，腿打坏了，走路成了大问题，右胳膊也不行，右手拿枪，只好“委屈”左胳膊了，所以就冲着左胳膊上部打了一枪。

如果按李文普所说，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那么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

李文普啊李文普，你真是一个从来没有骗过人的“老实人”啊，谎话漏洞百出，永远“编”不圆。可是你李文普，你承认你在林彪身边那么多年，对林彪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你“编”出

这样的弥天大谎，就不怕老天报应吗？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时的中央57号文件说，林彪亲自开枪打伤跟他多年的警卫人员。林办秘书于运深九一三时在毛家湾值班，当天就被监禁在值班室。他是在监禁时和林办所有人员一起听的中央57号文件，听到林彪亲自开枪，第一反应是不信。林彪连握个铅笔都怕凉，要别人用手捂热了才能递给他，身边没有枪，怎么可能开枪打伤警卫人员？

这个说法后来没站住脚，被官方认可的说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枪。李文普说：在审查时，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是自伤。很有“道理”啊，可是为什么不鉴定？其实是不是自伤很容易鉴定。而且当时的“枪战”，除了萧奇明的两枪，只是车里车外各打了一枪，其中一枪打在车上，另一枪打在李文普左大臂上。

还是那句话，“大红旗”并没有随林彪一家上天，留在山海关机场。第二天8341部队把“大红旗”擦了一下，看了一下车，车上还捡到刘沛丰的钱包，里面有60多元，还有小孩照片、工作证。“大红旗”车在，李文普也在，从弹道上很容易鉴定出来，给李文普包扎和检查伤口的医生也不止一个，都可以证明，但这些鉴定都没有做。官方认为，李文普没跟着走，就是好同志。如果鉴定，事情就复杂了。

李文普的枪伤就这样“含糊”过去了，没有权威的鉴定。

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

副团长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

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

李文普的枪伤在九一三事件中是小节吗？

### 63、为什么一直没有接到拦截“大红旗”的命令？

张清林回忆：没想到“大红旗”在门外30米的地方停了一下，接着好像听见两声模糊的枪响。我和萧奇明还在往前冲，我说开枪，萧奇明真当当真开了两枪。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萧奇明的两枪全打在“大红旗”左侧的玻璃窗上。但“大红旗”是防弹车，子弹只在玻璃上留下两个白点。要不是高级防弹车，那两颗子弹肯定打死杨振刚。事后，开枪一事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毛泽东更说得直接：如果打死了副统帅，那到底是谁害谁呀！

手枪的最远距离是25米，如果要打坏轮胎就好了。

其实“大红旗”车体高，底下是钢板，重五吨，轮胎都是“死”轮胎，夹层玻璃足有半尺厚，车体都是手工敲出来的，别说手枪了，手榴弹都砸不透。所以“大红旗”十分笨重，毛泽东觉得不舒服，以后他坐苏联的“吉斯”。林彪试了一试，很喜欢，因为“大红旗”里面宽敞，拉开座椅就可以休息。于是，“大红旗”就成了他的“坐骑”。

张清林回忆：我想跟着后面的汽车去山海关机场，拿枪把飞机破坏了，飞机就飞不走了。正好碰上豆豆的警卫、空军保卫部的杨森处长。杨森说，你在这里太危险，我去机场，你在这

里保护豆豆的安全。我这才返回来。

刘吉纯回忆：我赶快回到96楼，刚到楼前，林彪的车就出来了。因为没看见叶群的车出来，我跑到办公室，叫林办秘书李春生去看看叶群在不在。李春生还什么也不知道，回来说没看见。叶群的内勤看见叶群只拿了一个小包，以为她还要回来，就守着一大堆行李等着。内勤说叶群可能在卧室，他再去看看。林彪内勤小陈和小张懵了好一会儿，奔到院子里，边哭边说：他们都走了，都走了……宋德金问：李处长呢？跟着一起走了。李春生不信，进去看了一圈，跑出来大喊：首长走了！96楼一片慌乱，去哪儿了？去大连。去大连为什么不带上我们？宋德金说：快快，快调值班车。我一听更急了，感到问题的严重。还好院子里有8341部队的一辆“伏尔加”，正好宋德金出来，还叫上了李春生。考虑到只有我一个人有枪，还叫了一名带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开得很快，我们还是叫他再开快点。因为李文普半路下车，耽误了一会儿，我们都看见前面的“大红旗”了。

叶群司机小穆的妻子是叶群内勤，此时正在家休息。小穆还以为还是第二天早晨出车，听内勤说要走，拎上牙具袋，也顾不上妻子和行李，赶到96楼。还没有下车，叶群内勤喊，主任让你到56楼接豆豆他们去机场。小穆马上开车去56楼，看见56楼一片黑暗，以为人已走，掉头又回到96楼。小穆跳下车对叶群内勤小孙说，你告诉主任，56楼没有人，怎么办？小孙慌乱地说，他们早走了。小穆吓“死”了，他是叶群的专车司机，迟到了叶群准要骂他，他转身上车开着空车向机场追去。

刘吉纯回忆：我们的“伏尔加”追上了小穆。小张要开枪打，宋德金说：慢着，万一里面有豆豆，打错了人怎么办？要是打出去，小穆准没命。小穆看见后面“林办”的车在追，他怕叶群骂，开得更快。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有两道火车线，前面两个车刚开过去，一列货车来了，因为没有路灯，离铁路十几米司机才发现，因为车速太快，“伏尔加”司机转了个大弯，栽到草丛里，侥幸没撞上。要不是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沟里，必死无疑，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等长长的货车慢慢驶过，但前边的“大红旗”已经跑得没影了。

8341部队的三部值班车都追出来了。

自从“大红旗”从北戴河开出后，8341部队遵照周恩来“劝阻林彪不要上飞机”的指示，先后组织了8辆车70多人，由张宏副团长带队去追。23时45分左右，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带着六名战士坐两辆吉普车先出发，到山海关机场控制飞机，不准飞机起飞。副团长张宏交代：要与机场取得联系，有问题请示中央后再定。

8341部队只接到“追”的命令，没接到“击”的命令。本来“吉普车”比“大红旗”先走几分钟，但一直没有接到拦截的命令，不但没有阻拦，反而给“大红旗”让开了大路。

过了海边大桥，“大红旗”就超过了“吉普车”。因为屁股后面有车追击，“大红旗”像受惊的兔子，更快地向前窜去。

开到机场北门，林立果冲着警卫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把大门锁上。所以后面的“吉普车”怎么按喇叭，门卫也不开门，装听不见。后来“吉普车”火了，命令跟上来的卡车硬把铁门撞开，门扇都给撞翘起来了，现在痕迹还在。

林豆豆回忆：按照惯例，林彪上飞机前，8341部队要派人和先行车到机场布置安全措

施，上飞机检查，然后武装守卫。除了派警卫同机跟随，还要派部队乘另一架飞机护送。如果目的地没有 8 3 4 1 部队，要先乘飞机或火车前往布防。多年来，林彪非常厌恶这套繁文缛节，但为尊重 8 3 4 1 部队的安全措施，从未脱离过严密守卫和跟随。但奇怪的是，这次却始终没有执行。

叶群司机小穆的车“咬”着“大红旗”进了机场，但乱糟糟的场面让他停住了脚步。事后有人问，如果叫你上，你上不上？小穆说：当然跟着上。“林办”惟一目睹三叉戟起飞的只有小穆，而偏偏他事先一无所知。等刘吉纯他们的“伏尔加”开到机场，飞机已经上天。

刘吉纯回忆：我到了山海关机场，痛骂 8 3 4 1 部队的战士，你们都是死人，为什么不拦住？不是命令不准飞机起飞吗？你们等着挨整吧。我问于副大队长呢？战士说在那边。我说赶快，上调度室。我埋怨于仁堂怎么叫他们上了飞机，于仁堂说他的车慢，被后面的车超了过去，他们也是刚到不久。因为只是向干部讲了，战士都不知道林彪要跑，所以战士都站在那里不敢动。我想了一下，不应该埋怨他们，如果中央早下命令，他们是跑不了的。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动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

#### 6 4、李文普为什么不相信林豆豆的话？

李文普说，1971年9月12日是他一生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

据李文普回忆，上午他把他的女儿和刘吉纯的女儿送到空军疗养院当兵。下午，李文普在平台乘凉，林豆豆突然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其实林豆豆与李文普谈了不止一次，谈得最深。而且在9月12日以前就谈过，李文普似乎已经被说服，他甚至和林豆豆交换“情报”。林豆豆认为，在林办工作人员中，能阻止林彪走的关键人物是李文普。

李文普承认林豆豆和他谈过，他感到突然，不相信。李文普说，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要去广州；另外林豆豆与叶群感情不好，与林立果也有矛盾。叶群到处散布林豆豆有精神病，现在冒出这么大个“阴谋”来，真把我吓了一跳，我首先想这是林家母女又闹矛盾了。这个思想应该说是真实的。李文普问林豆豆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当然就更不相信了。我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前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原因之一。尽管李文普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他对林豆豆说，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的指挥。你不敢向林彪查问，却要阻止首长上飞机，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9月12日晚上，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豆豆又把他叫到小厕所，再次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李文普还是说，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可是据知情人说，林豆豆要向林彪报告，李文普不同意。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向林彪报告？还是李文普不同意林豆豆让他向林彪报告？反正李文普是不想去说。伴君如伴虎，从李文普的角度考虑，他不愿意向林彪报告似乎是比较可信的。

李文普50年代就是林彪副官，管行政和内勤。那时林彪要选个警卫班长，将来升成副官。跟黄永胜说了，从东北来的警卫团找，就找到了李文普。李文普愿意来，说光荣啊，就来了，当警卫班长，确实不错。以后李文普走了，新来的副官不太合适，林彪又叫李文普回来。在林彪眼中，李文普老实。李文普这样评价自己，文化不高，头脑简单，对高层斗争不大关心，整天为林彪的衣食住行服务。但实际上他决不是“大老粗”。李文普在调来前是很好的副指导员。50年代初能当上副指导员，肯定是一定的文化。而且从以后的很多事情看，李文普很有心

计。李文普很得林彪的喜爱，但叶群却将他“恨之入骨”。叶群在很多事情上都瞒着林彪。在杭州，有一次毛家湾打电话说了一些林家的事。叶群不让告诉林彪。林彪知道北京打电话就问，李文普按叶群的话回答，林彪发了大火，说我枪毙了你！后来知道是叶群搞鬼，林彪又向李文普道歉。

9月12日夜，周恩来下命令封锁飞机后，叶群知道有人向中央报告，而且中央已经采取了措施，再不跑就来不及了。李文普回忆，大约11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叫我等着，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要了飞机再走。叶群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们可以先走，到机场休息室等吴法宪。李文普认为叶群骗他，实际上吴法宪确实准备到北戴河，因为周恩来要到北戴河，吴法宪陪他。只不过最后没来。叶群跟着李文普出来催他快调车，越快越好，说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林立果也对李文普说，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什么东西也别带了！李文普要通知8341部队，林立果把电话按下，哪里也不要告诉，部队也不要告诉。

李文普说，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究竟往哪里走？我心里越发怀疑，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胡萍也不知道林彪要上哪里去，平时胡萍都是从李文普那里打听消息。胡萍说，9月左右，李文普给我打电话，说主任说了，他们在北戴河，最近准备去大连或青岛，还说到南边。林彪出去常灵机一动，就像坐汽车一样。可坐飞机哪里是那么简单，弄不好出点事就严重了。胡萍为安全起见，希望早一点知道消息，他叫李文普给他打个电话，好早做准备。现在李文普反过来问胡萍，林彪往哪里走，胡萍怎么能知道，只能说要走就走吧。

这时林立果叫李文普在叶群办公室门口看着，他给周宇驰打电话。因为线路不好，周宇驰没听清，林立果大声说了几遍“北上”。李文普说他听到了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那么“北上”李文普也一定听到了。可是“北上”还是含糊，对于北戴河来说，去大连也可以说是“北上”啊，何况林彪已经对他说了去大连。但是，李文普深知，掌握大权的是叶群和林立果，但他又不能问，因为他知道，叶群和林立果能骗林彪。也一定会骗他。林立果叫李文普快点调车，当时那种情况，林立果一个孩子，还没经历过这样的突变，做不到处变不惊。小战士说，林立果拿着枪，从这屋窜到那屋，举着枪，嘴里乱喊。这时，李文普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他回到秘书值班室，给张宏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张宏刚问怎么回事，电话就被林立果粗暴的压断了。

就这样，李文普带着越来越大的疑团上了“大红旗”。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